

辛亥革命史丛刊

第三辑

《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编



中华书局

辛亥革命史丛刊

第三辑

《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部

中华书局

1981年·北京

辛亥革命史丛刊

第三辑

《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18印张·396千字

193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800册

统一书号: 11018·964 定价: 1.70元

编 者 的 话

本刊是一个不定期的学术集刊，由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编辑，目的在于为辛亥革命史研究者提供一个交流研究成果和刊载历史资料的园地。

凡有关辛亥革命史的论文、考订、史料、图片、年谱、回忆录、译文、书评以及学术动态等，欢迎投稿。来稿字数多少不拘，如篇幅较长而又确有价值者，可以分辑连载，或作为《辛亥革命史研究丛书》出版。

来稿请写明真实姓名、详细地址、发表时的署名，邮寄“湖北武昌华中师范学院转《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由于本刊无专职工作人员，来稿务希缮写清楚，并认真核实引文，以免增加发稿和校对时的困难。

本刊尚属草创阶段，编辑工作缺乏经验，错误与缺点在所难免，希望广大作者和读者随时批评指正，并且不断给予大力支持。

《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

一九八〇年七月

目 录

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陈锡祺 (1)
孙中山和人民群众·····	肖致治 (16)
章太炎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吗? ——与李泽厚同志商榷·····	李润苍 (37)
论“二次革命”的几个军事问题·····	毛振发 (48)
坚持真理 坚持革命 坚持进步 ——辛亥革命前后的董必武同志·····	胡传章、哈经雄 (60)
禹之谟革命事略·····	成晓军、禹坚白 (72)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我国科学的发展·····	李迪、戴学稷 (86)
孙中山和日本·····	[日]矢次一夫 蒋道鼎译 (96)
美国传教士、孙逸仙和中国革命·····	[美]米泰洛 沈云鸥译 (99)
在日本逗留期间的宋教仁·····	[日]片仓芳和 蒋道鼎译 刘宗孟校 (113)
陈少白致犬养毅函·····	(127)
武汉战纪初稿·····	黎元洪主持编辑 (130)
湖北革命战见闻日记·····	[日]内田顾一 周树嘉译 (163)
革命日记(连载之一)·····	《汉口日报》编辑 章开沅译 (191)
辛亥革命史中文书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室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合编 (202) 华中师范学院辛亥革命史研究室

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陈 锡 祺

(一)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的一位伟大的革命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为了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耗费了毕生的精力。辛亥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一场伟大的革命。这场革命不仅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创举，而且对日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是我们史学工作者必须努力完成好的一项重要任务。

建国以后的十七年，在党的领导下，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研究是有成绩的。特别是一九五六年纪念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举行全国规模的纪念活动；一九六一年，在武汉召开了全国性的纪念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使得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研究，受到很大推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潮。从中央到地方，都做了有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出版工作；不少问题得到比较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发表了相当多的专门论著，在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这个领域里呈现了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

然而，在林彪、“四人帮”肆虐的日子里，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研究也遭到灾难性的破坏。在江青口中，孙中山成了“牛鬼蛇神”，追随孙中山参加过民主革命的人们，都成了“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因而不少人把研究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视为畏途，且因这次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所以就要“立足于批”。在这段时间内，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研究，可说是陷于停滞和倒退的状态。

“四人帮”垮台以后，特别是通过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场辩论以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研究，也出现了春天。史学工作者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解放，有关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学术著述不断出现，大有日益繁荣的景象。

过去，许多史学工作者发表了相当有份量的文章，但是很多重大问题仍然值得继续研究。譬如辛亥革命中的“反满”问题，就是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几乎无例外地把“反满”、“排满”作为革命的第一目标，“反满”的口号当时也确实起到了鼓动人心、推动群众走向革命斗争的作用。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吴玉章同志说：“辛亥革命时期的反满宣传，起了很大的作用，革命的风暴主要是这样鼓动起来的。”^①今天，大家都知道辛亥革命并未成功，但在当日，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清帝退位之时，几乎没有人不认为革命已经成功。原因是他们革命的目的，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走狗和

^① 吴玉章：《辛亥革命》，第16页。

集反动之大成的清政府，清政府既倒，则目的已达，革命当然也就算成功了。从这里可以看出，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的绝大多数对革命任务理解的肤浅。只有孙中山在同盟会成立以后，高瞻远瞩，申明民族革命，并非仇恨满洲人，而是反对残酷统治中国人民的清政府和迫害中国人民的那些满洲人，这是多么广阔的胸襟和伟大的气魄！过去，有的历史学家（特别是解放前）把“反满”的意义过份夸大，固然是不正确的；国外有的人（特别在六十年代后的苏联），把反满作为辛亥革命的首要问题，更是别有用心的。但后来，我们也有些人对这个问题采取回避或简单贴标签的方法，也是不能把问题说清楚的。我想，反满这个口号的提出，是当时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产物，革命派提出这个口号，有深刻的反帝、反封建内容。当时这个口号被革命党人乃至广大群众所接受，不是没有原因的。当然，这个口号也有两重性，有的同志对这个问题写了很好的文章，但我认为这个问题还有继续深入探讨的必要。

又如，资产阶级与农民关系问题，也是一个时常讨论而没有完全弄清楚的问题。民族资产阶级当时究竟代表不代表农民？同盟会的纲领代表不代表农民的利益？资产阶级革命派有没有有意识地发动农民？如果发动了，程度如何？有哪些实际例子？会党是不是农民性质的秘密结社？同盟会利用会党，是不是就是利用农民？群众革命情绪的高涨包不包括农民在内？农民的起义与农民反抗运动的勃起，与革命派的活动有没有联系？这些都是我们希望弄清楚的情况。因此，认真研究各地农民的生活、农民的情绪，农民对清政府、对革命和革命党人乃至对立宪派的态度，各地农民在辛亥革命中的具体行动，我们都应尽可能细致地做调查研究工作，根据确凿可信的材料写成专题论文。

此外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研究，如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思想的变化发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状况；中国革命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各种制度的演变等等。

回顾三十年来，我们在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研究上，总的来说，是有成绩的。但是，这些成绩与形势发展的要求还是远不相称的。就以对孙中山这样一位伟大人物的研究来说，建国已经三十一年了，还只是在一九五六年纪念他诞辰九十周年时出过两本选集，那是太单薄了，供研究之用是很不够的。至于已出版的年谱、传记，无论篇幅或材料都有待增补和扩充。这就足以说明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很落后。但我知道现在很多研究机构和个人正在有计划地进行着这方面的工作，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有较大的进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成了热潮，中国近代史成了热门，而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也曾经成为最活跃的研究课题之一。特别是日本和美国，六十年代以来，发表了不少专门论著，提出了不少新问题。我们应该恰如其份地肯定和尊重别人的成绩，学习别人的长处，虚心听取别人对我们研究中一些问题的批评意见，做好学术交流工作。

过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中国的时候，虽然也编纂了一些孙中山的文集、丛书、全书、遗教之类的集子和出版了一些史稿、年谱、传记之类的著述，但在旧中国，几乎没有出现过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研究著作。国民党政府逃到台湾以后，虽仍打着孙中山的旗子，可是在孙中山问题的研究上，除了个别专家外，可以说是没有什么重要成就。一九六五年，孙中山逝世四十周年的时候，台湾某传记文学社的主编就曾经慨叹地说：“作为这一世纪的中国人，我们骄傲一百年前诞生了这样一个伟人，但是，我们同时也应引为惭愧的，关于这一位领导我

们走向现代化道路的旷世哲人,许多中国人对他那多姿多彩的一生都不甚了了,我们所知道的,只是止于宣传的一些神话。”^①

我们也看到,近年来,由于台湾一些学者的努力,收集、整理、出版了不少有关资料,也出现了一些具有研究功力的著作。譬如一九六九年修改增补出版的《国父年谱》第三版,一九七三年出版的《国父全集》,就比旧版大有进步。此外,一九七五年还出版了《研究中山先生的史料与史学》一书,对于孙中山研究中资料的收藏、整理和研究的情况,作了专题的汇集。一些学者对辛亥革命时期的问题也发表了较有价值的著作,应该说,这是一些有利于今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进一步开展的情况。

不过,也必须指出,台湾也好,国外也好,由于立场、观点、方法的不同,他们的许多学者关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看法与我们不同,甚至存在着根本分歧。譬如,外国有些人说我们出于政治需要,对孙中山估价过高,因而是“新正统学派”(他们称解放前的国民党是“正统学派”)或者是“新孙中心论”。当然,多年以来,国际史学界对辛亥革命的看法非常分歧;而对孙中山的评价,分歧最大的则是他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地位和作用。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对他们提出的问题,从正面阐明我们的观点。

国外有一种意见认为,辛亥革命根本不是一次革命,它只是象过去历史上改朝换代一样,至多只是某种政治变革,而不是科学意义的革命。在美国也有人认为清政府不是革命推翻的,而是它自己垮台的,因为它犯了许多错误,如派留学生、建新军、实行铁路国有等。

这个问题牵扯的范围比较大,如果辛亥革命不是革命,那么近代中国还有什么真正的革命呢?旧民主主义革命没有了,当然也就无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涉及到中国近代、现代历史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因此,我们应该给以认真对待、科学回答。

又有一种意见认为,辛亥革命虽是一场革命,但是在革命爆发的前后,立宪派的作用超过革命派。如有人认为在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以前,立宪派通过种种政治、社会、经济活动,形成了领导变革的社会势力,他们凭借自己的政治影响、社会地位、经济实力,提出了最具体、最系统和最现实的政权变革或政治革命的构想,具有在社会上和地方上最大的政治号召力。从武昌起义到民国成立,是在他们的领导之下,联合同盟会和地方旧势力共同建立新政权(从省的军政府到南京临时政府),革命派和袁世凯从妥协到合作,也是通过他们的撮合。

持这种观点者认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是一个涣散无力的组织,它所领导的起义很快就失败了,同盟会的领导人包括孙中山在内都没有做什么富有成效的工作;如果辛亥革命取得了什么胜利的话,首先应归功于在国内长期活动着的立宪派。这个论点否定了革命派在辛亥革命中的主导作用,否定了孙中山作为革命派的领袖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还有些人虽然同意辛亥革命是革命派领导的,但认为孙中山并不是革命派唯一的中心,甚至不是革命派真正的中心。他们说,兴中会时期杨衢云的作用超过孙中山;同盟会是孙中山和黄兴共同领导的(双头领导);华兴会是同盟会的主力,许多实际工作,黄兴比孙中山做得更多。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放弃政权斗争,让位于袁世凯,不切实际地幻想搞实

^① 黄季陆等:《研究中山先生的史料与史学》,第200页。

业建设,实行民生主义,远不如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制,努力通过议会斗争,以求实现多数党组阁,从袁世凯手中夺回权力。宋教仁是为中国议会民主奋斗终生的最坚定的人。这就涉及到对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几个领袖人物如何评价和他们的位置应如何摆的问题。

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即(1)辛亥革命是不是一次革命?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怎样?(2)在辛亥革命中,究竟是立宪派还是革命派起主导作用?(3)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人物中,谁是革命的旗帜?这些都是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中的重要问题,需要国内外学者相互切磋与共同讨论。下面,我提出自己一些粗浅的看法,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二)

我认为,辛亥革命不仅是一次革命,而且是一次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充满着农民阶级反对封建压迫和剥削的斗争,这种斗争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改变,农民阶级的反压迫和反剥削斗争,发展成为震撼中外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然而,即使是太平天国那样达到历史上农民起义高峰的革命运动,也因为缺乏代表新生产力的新阶级领导,不可能冲破封建家长制的网罗,摆脱小生产习气与皇权思想。太平天国那种高度发展的农民的平均平等思想,在现实中只能倒退到封建生产关系所许可的范围内,承认并且实行封建专制政体。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体现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使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不能实现。然而,义和团那种保守迷信和笼统排外的行动,却又偏离了中国当时必须发展资本主义的轨道。

到十九世纪末,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已经具备一定力量。他们开始登上了政治舞台。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改良派,提出了维新变法的方案,要求学习西方,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要求改变封建专制,从而在近代中国出现了第一次思想解放高潮。但是,他们对君主制度采取维护态度,不敢正面反对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封建主义的政治代表清政府。他们在中国已越来越陷入半殖民地深渊的时候,希望在一个并无实权的皇帝支持下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他们这种改革的尝试很快就在旧势力的压迫下不能不以失败告终。

在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相继失败后,爆发一场旨在推翻清朝封建专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日趋成熟。

一九〇一年后,清政府实行“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政策,完全变成了“洋人的朝廷”。为了欺骗群众,维护自己的统治,它举办一些“新政”,如派留学生,练新军等,也虚伪地表示要实行“立宪”,这说明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清政府已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但是,这个政府的腐朽而顽固的反动本质,又使它不能实行任何真正的改革。结果,在它统治的最后十多年,它与人民群众的矛盾更进一步激化了,人民已经不愿照旧生活下去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早就发动了武装起义,农民和其他劳苦群众的抗捐、抗税、抗租、抢米以至暴动的次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原来对清政府忠心驯服的立宪派也离心离德,统治阶级内部更呈现分崩离析的状况。在武昌起义爆发前,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都已处于内外交困、威信扫地

的境地，它在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统治，已从根本上动摇。因此，皇族内阁成立后的总理大臣，在谈到时局时也只能绝望地“掩面大哭”。^①武昌起义爆发，这个反动政府尽管竭力镇压，但已无法挽回覆亡的命运。

这个反动政府决不是自己倒下的，而是被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人民推翻的。几乎在改良派开始维新变法活动的同时，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政治代表——孙中山，就组织了最早的革命小团体兴中会，选择了用暴力推翻清政府的道路。

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力量得到进一步发展，组织了革命党——同盟会，制定了“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的纲领，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旨在推翻清政府的武装起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仅继承了中国农民起义那种不妥协的反封建传统，而且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出了当时最先进和最革命的纲领。这个纲领，农民提不出来，资产阶级改良派也提不出来。无论从领导这次革命的阶级来看，还是从他们的纲领来看，特别是从他们为实现这个纲领的斗争来看，辛亥革命都堪称一次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当时对辛亥革命给以热情的赞扬，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

就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任务来说，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辛亥革命没有完成这两大任务，所以，它不是一场成功的革命，而是一次基本上失败了革命。但是，能因为它失败了就否认它是一场革命吗？清政府当时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的最高政治代表。中国要独立，要走上发展资本主义道路，要建成一个近代化的国家，最直接的大障碍就是清政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清政府是反对还是拥护，是革命和反动的分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把斗争矛头对准清政府，是符合近代中国革命的要求——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尽管辛亥革命在反帝、反封建方面还做得很不彻底。

对辛亥革命，我们认为，国内史学界过去也存在估价偏低的倾向。事实上，辛亥革命不仅结束了清朝二百六十多年的统治，而且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尽管这个共和国只是昙花一现，辛亥革命也最终失败了，但无论如何，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政治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这以前，中国是在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皇朝统治之下，人民没有任何哪怕是名义上的民主权利；在这以后，作为中国封建主义最高权威的象征——皇帝，就再也不能合法存在了，纵然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复辟帝制，也绝不能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站稳脚跟。如袁世凯洪宪称帝、张勋拥宣统复辟，仅仅几个月或十几天，就在“人人得而诛之”的讨伐声中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了一个具有更完全意义的阶段，它是中国人民民主精神高涨的新起点。没有辛亥革命，就不会有五四运动和接踵而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承先启后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我们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与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统一的。尽管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是民族资产阶级，但在当时，资产阶级，特别是代表它中下层的革命派，也

^① 见《辛亥革命》(八)，第39页。

是人民群众的组成部份。当无产阶级还未以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而民族资产阶级还在向上发展时期，他们还是人民群众中最先进的人物。我们过去对辛亥革命的估价偏低，是不符合历史的客观实际的，因而也就有背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

有人认为，当时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力量，还不足以发动推倒清政府的强大的革命运动。诚然，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幼弱的，特别是与强大的敌人相比较；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他们没有能力领导一次彻底胜利的革命运动，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毕竟是已经登上政治舞台的最先进的阶级，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则是这个阶级最先进的代表。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这个阶级不是在衰落下去，而是在向上发展，它不是惧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① 他们的阶级利益，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是一致的；他们的纲领，也在客观上反映了广大劳动群众的一些要求。一九〇六年，孙中山在《民报》发刊周年纪念会上概括他的革命纲领三民主义时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中国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制，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制，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达到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② 孙中山的话反映了这个阶级的先进代表对自己历史使命的认识。他们是满怀信心地领导人民去推翻清政府的，早在一九〇四年，孙中山就说过：“满清政府的垮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③ 不少革命党人在斗争中百折不挠，甚至毫不踌躇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大量历史事实说明，这个阶级当时是有信心，也有力量领导一场革命的，事实上它也是领导了，尽管这次革命最终并没有成功。

有人认为，革命派没有有效地发动群众，所以辛亥革命算不得革命。我们一直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和不能从根本上发动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群众，这是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我们不能说资产阶级完全没有去发动群众，或在发动群众方面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孙中山一八九四年在檀香山，一八九五年在香港组织兴中会，都发布了宣言。为什么发布宣言？还不是为了发动群众？事实上，早在一八九五年，他就通过会党、军队、绿林发动了部份群众准备参加广州起义。此后，革命派大量印行宣传品，也是为了鼓舞群众走上革命斗争的道路。孙中山一九〇三年在檀香山演说，常“座为之满”，或“听者二、三千人”。^④ 一九〇五年以后，他在东京演说，“环听辄以数千”，“革命党报发行购阅，数逾数万”^⑤，和革命派正在进行论战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报纸《新民丛报》不得不承认革命宣传在群众中产生的深刻影响，说在革命派宣传鼓动下，“贩夫走卒皆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⑥ 这说明了下层劳动人民也接受了革命的宣传而投身革命。

资产阶级毕竟不是劳动阶级，资产阶级革命家是很难深入到工农中去组织群众和发动

①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24—425页。

②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9页。

③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1页。

④ 冯自由：《革命逸史》四集，第21页。

⑤ 《辛亥革命》（四），第41页。

⑥ 《新民丛报》第92期。

群众的。但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他们为了举行武装起义，曾通过会党发动了一部份劳苦群众。可以说，革命派举行的历次武装起义，几乎都有工农群众参加。以一九一一年三·二九黄花岗之役为例，牺牲的八十六位烈士中，已知有工人十七人，农民十三人，占总数三分之一。四川保路运动中，同志军与清军激战，也有大批工农参加战斗。湖北革命党人更是大批直接投身军营，在士兵群众中做耐心细致的发动工作。如果没有这样长期的艰苦的群众工作，在武昌起义爆发前夕大逮捕的恐怖中，是不可能发动一场胜利的起义的。

对辛亥革命时期群众的革命情绪如何估计，革命党人在群众中做了哪些工作，群众的自发革命斗争与革命党人的影响的关系等等，我们都应根据更具体、更确凿的材料进行科学的分析，不能老是用鲁迅在《阿Q正传》中对辛亥革命的艺术夸张的描写来概括全国各地的情况。鲁迅所写的只是一种典型，它反映了辛亥革命消极的一面，但不能说在辛亥革命中各地都是如此，仿佛整个革命仅仅只革掉一条辫子。况且，阿Q还是要革命的，这也可以算作群众革命情绪高涨的一种表现吧！

辛亥革命不仅对中国社会历史具有深远的影响，对国外，特别是亚洲各国，也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一九一二年一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即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遭到破坏的世界意义。^①一九一三年，列宁在写《亚洲的觉醒》一文时，他首先提到“早就被称为长期完全停滞的国家的典型”的中国，在辛亥革命爆发以后，“中国的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高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②列宁明确地指出，辛亥革命不仅在国内推动群众运动和民主主义高潮的发展，也影响到国外的革命运动。在荷属印尼的中国华侨从中国本土带来了革命运动，促使革命民主运动遍及荷属印尼——爪哇岛等荷属殖民地。^③辛亥革命对亚洲其它国家，如印度、泰国、缅甸甚至拉丁美洲等国都产生很大的政治影响。特别是对于近邻的越南，影响更为直接、迅速、深刻，使当时正在摸索、寻找出路的越南革命转向更为进步的新时期。“武昌起义爆发和取得胜利，民国临时政府在北京成立并由孙中山当总统等消息传到越南，使潘佩珠和维新会的同志欢欣鼓舞”，“产生了新的信心”。越南的革命群众也“人情激奋，比前大增”。^④有的群众家里公开悬挂孙中山和黄兴的照片。^⑤越南人民在辛亥革命的鼓舞下，将一九〇七年以后分散各地的革命力量重新集合起来，模仿同盟会而成立越南光复会，从此抛弃君主主义，走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阶段。辛亥革命对于外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巨大影响，是中国近代其他革命运动所不能比拟的。如果辛亥革命不算革命，那么，二十世纪初，亚洲就没有什么革命能称得上革命了，而列宁说的“继俄国一九〇五年的

① 《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22页。

②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47页。

③ 同上。

④ （越南）章收：《孙中山与二十世纪初越南革命的关系》，见《广东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孙中山资料专辑），第328页。

⑤ 同上。

运动之后,民主革命席卷了整个亚洲——土耳其、波斯、中国。”^①也就无异是无的放矢了。

(三)

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问题,一直是辛亥革命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历史情况复杂,研究者的观点、方法不同,国内外史学界对此意见极为分歧。

直到最近以前,国内不少研究者对辛亥革命中的立宪派,几乎全持否定态度。有的著作或资料选辑,干脆把立宪派划归革命对象一边。在国外,如前所述,却有不少学者对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估价极高,认为他们是辛亥革命的主导力量。

立宪派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也具有这个阶级所共有的两重性。它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较多的联系,所以他们害怕帝国主义,维护清政府,恐惧并反对革命。但它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又有矛盾,因为它毕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种矛盾有时还相当激烈,一九〇五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和一九一一年的保路运动都可以说明这一点。历史是复杂的,辛亥革命时期更是一个异常激烈动荡的变化时期。同时,由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这样,就决定了立宪派因时、因地、因势而有不同的表现,因而需要结合不同社会历史条件来观察和分析他们的两重性表现,以评定其功过。

立宪派的最早开端,可以追溯到戊戌变法时期,不少立宪派的头面人物,曾是维新运动的倡导者和积极参加者。其中有些人经营近代企业,本身就是大资本家,他们在社会上活动的能量是很大的。有些立宪派在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方面,曾经起过启蒙的积极作用,而在某些方面甚至比革命派贡献还大。即使在清末那几年,立宪派的宣传活动,固然有抵制革命的一面,但客观上确又起过揭露清政府、激励人民走向反清革命的作用。过去,我们不少著作对立宪派的积极作用,不是轻描淡写,就是忽略不提,甚至把这些积极的作用说成是完全反动的作用,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武昌起义爆发,很多立宪派不但没有公开反对革命,还表现了一定的热情,向革命靠拢,宣布赞成共和,不少人参加了地方军政府及南京临时政府的工作。立宪派在短时间内,由立宪转向共和。过去,我们都说他们是投革命之机,是想要弄阴谋,伺机夺权,我们还批评革命派不该接纳他们。这些说法,并非没有根据,比如从现在我们据有的材料来看,张謇表示拥护革命,就是为了通过革命党人让袁世凯取得政权。但是,立宪派并非有统一组织的政党,各地立宪派主要是根据他们所处的地位和切身的利益而开展活动的。武昌起义爆发后,有的地方(如上海)的立宪派还支持了革命派的起义。在选举临时大总统的时候,参加投票的属于立宪派的代表都投了孙中山的票,这也很难说是阴谋。所以,对辛亥革命中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立宪派,作具体分析是十分必要的。而现在,我们深感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不够。

诚然,武昌起义后立宪派的某种转变,决不是偶然的;它是由当时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

^①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47页。

势造成的,也可以说是立宪派为了自身利益被迫这样做的。这种转变条件,在武昌起义爆发前,因立宪派在国会请愿运动和保路运动中同清政府发生的矛盾的日益扩大而逐步形成。可以说,在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以前,整个立宪派都是忠于清政府,相信君主立宪能够挽救国家危亡,使他们自身的利益得到发展;而召开国会则是关键。当清政府粗暴地拒绝三次国会请愿时,立宪派不能不对清政府深深失望。清政府的顽固态度使自己与立宪派的矛盾大大激化了。连梁启超都在《国风报》上发表文章,斥责清政府为“恶政府”,说:“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迎刃而解。”^①一些比较激进的立宪派人物如汤化龙、蒲殿俊、谭延闿等人,甚至有和清政府决绝的表示。

对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关系,我们过去较多强调武昌起义前两派的斗争,这并没有错。但我们也应看到,革命派主要是在海外与康梁进行论战,而武昌起义前,在国内,尽管两派对立是存在的,但实际上几乎没有进行过什么大规模的严重斗争。在清政府顽固拒绝改革的情况下,不少立宪派对清廷增多一分厌恶,就对革命派增多一分同情。特别是他们既是同一阶级不同阶层的代表,本身的阶级利益也会有某些一致的地方。比如,两派都要求维护国家主权独立;都主张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当然在道路、路线上有严重分歧);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都有矛盾和联系(只是程度不同);对“下层”人民起来革命都有恐惧(也是程度不同)。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两派在一定条件下就有合作的可能。所以,有的立宪派人士,在武昌起义爆发前,就与革命党人有着良好的关系。如广东谘议局副议长丘逢甲,就曾推荐同盟会会员古应芬担任谘议局秘书长,有人甚至称他“喜欢革命党人”^②。当革命党人受到清政府官吏追缉时,他一次又一次加以掩护。在广东、河南等地,都有两派合办报纸的例子。在云南,政治上接近立宪派的蔡锷与革命党人的协同关系,更是大家所熟知的。

武昌起义后,大多数地区更出现了立宪派与革命派短时期的合作关系。我们以前总是说立宪派在武昌起义后没有做过一点好事。可是,即如张謇这样一个原来对革命派并无好感的人,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也未尝没有为革命做过一些事(如解决一些财政问题),以致孙中山晚年还称道他当时“热心赞助革命”^③。又如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我们过去大多说他很坏,此人后来也确实当过袁世凯的鹰犬,但他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表现却很值得我们研究。武昌起义的第二天,他即加入了革命阵营,表示了明朗的态度,颇得革命党人好感,推他担任了湖北军政府总参议和民政总长。他当时发电表示与清廷决绝,并号召各省独立,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不管当时他是什么想法,他这样做客观上还是有利于革命而不利于清政府的。

综上所述,可见在辛亥革命时期,立宪派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一样是有两面性的。过去,我们对立宪派研究得不够,该肯定的积极方面没有肯定,今后,要在这方面多做工作,让历史恢复本来面目。

肯定立宪派在辛亥革命时期起过一定积极作用,这是尊重历史。但如果把立宪派的作

① 见《国风报》第二年七号,第28页。

② 邹鲁:《回顾录》第一册,第33页。

③ 《国父全集》第二册,第535页。

用极力夸大,使之凌驾于革命派之上,那就不是历史本来面目了。

在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的两派,究竟哪一派起主导作用?究竟哪一派领导了这场斗争?我认为,是革命派而不是立宪派。

众所周知,革命派和立宪派的根本分歧,就在于要不要用暴力推翻清政府。这个分歧决非无关重要。清政府既是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代理人,又是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严重障碍,而对于这样一个政府,立宪派却表示拥护!所以,两派围绕要不要反清问题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关系到中国历史要不要向前发展的大是大非的斗争。革命派从一九〇三年开始,就全面地对保皇——立宪派进行批判。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间,孙中山的革命派同康、梁一伙的论战达到高潮,并且赢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我认为,这种批判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必要的。如果革命派没有在思想战线上扫荡“保皇毒焰”,也就不会有一九一二年推翻清政府的胜利。

立宪派虽然在经济上有一定势力,社会上有较高的地位,政治上有较大的活动能量,但是,他们却拥护人民所痛恨的清政府。他们反对革命,看不起人民,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真正拥有很大力量。即如作为辛亥革命导火线的保路运动,虽为立宪派所肇始,但参加这一运动的群众,却超出了立宪派的原定轨道而趋向革命。这并不符合立宪派的预想,而是人民群众革命化的结果,也是各地革命党人宣传组织工作的成效。

同时,立宪派也并没有什么严密的组织。尽管他们建立过政闻社、宪友会之类的团体,并开过多次会议,但却没有象同盟会那样组成一个统一的政党。而同盟会,它的势力几乎渗透到国内外的各个角落;有的不属于同盟会的团体,也和它有直接间接的联系。后期的同盟会诚然比较涣散,领导集团内部争吵,共进会、光复会和中部总会各自独树一帜。但即使这样,在革命起义发动时,他们仍然能够配合行动,共同参加斗争。如一九一一年四月黄花岗起义时,光复会的李燮和等响应同盟会南方支部的号召而千里赴义,远在长江流域的共进会也积极筹备响应。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虽有宗派情绪,但在武昌起义前后,在组织、领导长江中下游斗争方面,起过重要作用。直到一九一一年底,孙中山回国,革命派仍然团结在同盟会旗帜下,共同组织南京临时政府。革命派有统一的组织、统一的纲领,又有共同推戴经过考验的领袖,反清斗争过程里在人民心目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这些条件,都是立宪派所不具备的。因此,在推翻清政府的斗争中,就很难说他们比革命派有力量。

清政府是被以革命派领导的武装起义为主体的人民革命浪潮推翻的。这些起义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清政府,也大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投入革命。多少革命党人在推翻清政府的斗争中英勇牺牲,而立宪派却是拥护清政府的。尽管他们对清政府已很不满,但直到武昌起义前,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立宪派的人真诚赞成同盟会的纲领和共和国的方案,没有一个立宪派的人公开赞成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行动。在整个立宪运动过程中,我们也没有看到哪一个立宪派组织过旨在推翻清政府的暴动,更没有看到哪个立宪派为推翻清政府而献身。说到底,如果历史是按照立宪派的主张和愿望发展,清政府就不至于倒台,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把推翻清政府的功劳大部归到他们头上呢?

从武昌起义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少立宪派在新的政权中取得位置,有的还为革命

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不管哪一个立宪派人，他要起作用，就必须宣布接受革命派“驱除鞑虏”和“建立民国”的纲领，就必须打出革命派的旗号。例如，武昌起义后，居正委托汤化龙草订各科条例，汤完稿后仍须托称“同盟会本部所拟”^①。从全局来看，发挥主导作用的确实是革命派。孙中山只身从国外返回，马上被举为临时大总统，也可以说明革命派当时的崇高威信和政治上的主导作用。

我们还要看到，有的立宪派在武昌起义后，还千方百计为挽救清政府的覆亡而努力。而在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但没有一个立宪派坚决捍卫过革命政权，相反，大多数立宪派都和袁世凯所代表的旧势力合作；在导致辛亥革命失败这一点上，他们是起了帮凶作用的。

总之，对立宪派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评价，既不能一概抹杀，也不应估计过高。他们起过一些积极作用，但更起过不少消极作用，而且这种消极作用的危害还是很大的。我觉得，可以大致这样看：在武昌起义前，立宪派一方面起着反对革命的作用，一方面又起了揭露清政府的积极作用；从武昌起义到临时政府成立，立宪派与革命派有过合作，由于他们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地位，在加速清政府的覆亡方面是起过一定作用的。但他们的加入，却又增加了革命派与旧势力的妥协，导致革命不彻底和终于失败。至于临时政府成立以后，立宪派则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旧势力密切合作，促使辛亥革命迅速归于失败，从主要方面来看，其作用是很恶劣的。

(四)

如果说，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那么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要领袖又是谁呢？按列宁的说法，“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②，革命派的领袖不是一二个人，而是一批人。但这一批人中，在威信、经验、影响等等方面，仍然有一些相比较而存在的差距。就是在这个领导集团中，通过革命实践，造就一个比较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的最重要的领袖，也就是这个领导集团的中心人物。毛泽东同志曾多次指出清政府是孙中山领导的党和人民一起推翻的。孙中山领导了同盟会，而同盟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辛亥革命时期，中国革命派是当时时代的中心。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同盟会的领导人，说他是革命力量的中心，似乎并无不妥之处。可是有些人认为，过去把孙中山在革命中的地位看得太高了，太重了。甚至于认为过去对孙中山评价之所以高，是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情况果真是这样吗？

二十世纪初，是中国人民，特别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革命觉悟的时代。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政党——同盟会，集中了国内外革命的精华，在长期革命实践的锻炼中，造就了一批在群众中享有威信，具有经验的革命领袖。如黄兴，在同盟会中，是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领导人。在同盟会的成立过程中，和孙中山紧密合作；在多次武装起义中，经常亲临前线，身先士卒，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忠诚质朴，以大局为重，始终维护孙中

^① 居正：《居觉生先生全集》，第512—513页。

^②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97—198页。

山的领袖地位和同盟会的团结，在革命派中有很高的威信。宋教仁则是一个杰出的政治活动家，长于组织、宣传，在领导中部同盟会总会，策动长江中下游的革命运动，作出了很大贡献。民国成立后，他坚持为资产阶级民主而斗争，最后还为它贡献了年青的生命。还有章太炎，曾经担任过《民报》的社长和编辑，在和改良派的斗争中，发表了许多光焰逼人、富有威力的文章，在思想界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然而，作为同盟会中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担任最重要职务的主要领袖，则只能是孙中山而不是别人。尽管孙中山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作为革命领袖来说，有些还是比较严重的缺点；但在辛亥革命的整个过程中，他比其他人站得高，看得远，始终站在正面指导运动。他是最早倡导革命的一个人。同盟会的纲领就是他提出来的，他的民族、民权、民生主义思想，列宁后来评价为“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①思想。辛亥革命就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

同盟会在领导辛亥革命的过程中，有两件事值得大书特书。一件就是和改良派的论战，一件就是领导武装起义。

在同改良派的斗争中，孙中山的表现是非常突出的。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康、梁保皇党“为虎作伥，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尤甚”^②。如前所述，比之同时期的革命家，最早认清康、梁的嘴脸，起而与之斗争的，不是别人，正是孙中山。

一九〇三年，孙中山亲自撰文和改良派斗争。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③。声明：“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做事”^④。这种鲜明而坚决的态度，达到了同时期的革命家所未能达到的水平。同盟会成立以后，孙中山继续领导同志坚持战斗，夺回了曾经为保皇派占领了的思想阵地，大大促进了群众革命情绪的高涨，为辛亥革命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从领导武装起义来说，孙中山自建立兴中会开始，就决定用武装斗争的方式推翻清政府。从一八九五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到一九一一年黄花岗起义，孙中山先后领导了十次武装起义。虽然在选择起义地点、处理经费问题方面，在同盟会中引起不少争议，但十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锻炼了革命同志，动员和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投入反清斗争。到武昌起义爆发时，群众斗争的锋芒，汇合成革命的海洋，终于淹没了整个清朝政权。

孙中山为了革命，曾经环行地球四次，走遍天涯海角，寻求革命真理。他一生想的是革命，说的是革命，做的也是革命。正如鲁迅所说的，“孙中山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⑤这一点非常难能可贵。他不象同盟会其他领导人，失败了就垂头丧气，“事败心灰”，或推诿责任，闹意气之争，而是屡败屡战，从不灰心。一九一〇年三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同盟会的许多领导干部“举目前途，众有忧色”。孙中山当时在美国，以非常豪迈的气概，

①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24页。

②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3页。

③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52—53页。

④ 《国父全集》第三册，第31页。

⑤ 鲁迅：《集外集拾遗·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